

全国统一命题无法化解异地高考困境

刘海峰

异地高考是中国特殊国情下产生的招生考试难题,它与人口流动、户籍管理、高考移民等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受制于高校招生指标的分省投放,牵涉到外来考生与本省市考生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聚讼纷纷、意见分歧。观点对立双方唇枪舌剑、各有道理。

如何化解异地高考的困境,许多人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有些学者提出要改变高考分省命题、恢复全国统一教材和高考试卷,这样流动人口子女便可以随父母在任何一地或多地接受教育后回乡高考;或者实行统一录取体制,即完全按考试成绩来决定重点大学或部属高校的录取,这样就可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我认为,上述设想愿望虽好,但实行起来很难。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的时候,考生只有5.9万人,“文革”前考生最多的年份也只有近40万人,虽然统一命题,但在高考60多年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统一评卷。中国现在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900多万,是其他大国参加升学考试人数的十倍以上。其他国家的统一考试试卷可以集中在一个考试中心评阅,如日本国立公立大学的第一次共同考试,命题和评卷都集中在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进行。而中国早就实行分省市区评阅高考试卷,评卷宽严尺度无法完全统一,自然不能完全依据分数来决定录取。如果要将全国900多万份高考试卷集中到一个地方来评阅,显然又不现实。

现在许多省市已经采用网上阅卷,相比过去而言,从技术上实现全国统一评卷不是没有可能。但若全国统一标准、统一评卷,并真正统一分数线、完全按成绩来录取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因为即使将边疆省区排除在外,很有可能出现考上北大、清华的考生高度集中在东南少数省份,而内陆一些人口大省则极少出现考上北大、清华的情况。优秀考生高度集中在某一区域,这在中国考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两者哪个优先,是一个千年轮回的争论。将录取公平问题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便会发现在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长期存在着两难选择。唐代处在中国科举考试发展史上的早期,当时实行的是基本上按各地人口比例解送举子到首都参加统一考试,结果科举及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绝对优势,而且尤其集中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一带。到北宋中期,科场录取人数的比例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南方考中进士的人数往往占录取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远远超过北方。宋英宗治平三年(1064年),发生了一场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举人的争论,司马光主张分区定额录取,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考试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到明代初年又出现了会试“南北榜事件”,后来实行“南北卷制度”,分区定额取中。但同样在属于南卷或北卷的区域,各省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有的省许多科都没能考上几个进士。最终,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实行分省定额录取办法,并一直沿用到1905年科举废止。

20世纪20年代,各高校实行单独考试、完全凭考试成绩自行决定录取,而各校在全国各省的录取标准却是统一的。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存在很大落差,因而采用同一录取标准导致各省区之间的升学率失衡,一些边疆及文化落后省区很少有考生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如1923年,在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没有一个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蒙古等多个省份的考生。为此,当时第十届教育联合会曾提议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招生宜酌定各省区名额,建议高等学校将部分招生名额分给各省区,但未能实行。

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以后,逐渐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进行各校之间的调配,或实行计划招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有人以为现在的重点大学在各省区录取名额差距巨大是因为实行招生指标的计划管理所致,但实际上,不实行计划管理,各省区之间的差距将更大。

恢复高考的1977年是实行分省命题,之后采用全国统一命题。上海在1985年开始实行单独命题。2002年北京也开始实行自主命题。自2004年后,又增加了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单独组织本省市全部或部分高考科目试题的命题工作。现在,全国(除港澳台)实行分省命题的省市区已达16个。

高考分省命题利弊兼具,具有分散考试安全风险、减少因地域差异带来的考试偏向、有利于各省不同进度新课程标准的推行、增加省级考试机构的专业性等优点,但也存在命题质量不一、命题成本增高、削弱高考权威性、各省之间成绩不可比等问题。在命题权或命题任务下放之后,各省的命题机构和组织队伍已经建立起来,要再改回全国命题并不容易。当然,这只是讨论异地高考时需要附带认识的问题,如果回到全国统一命题,能使异地高考问题迎刃而解的话,那也值得尝试,关键是即使回到全国统一命题也无法化解异地高考的困境。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